

文章编号:1005—0523(2006)06—0134—04

中英思维模式差异对英汉学术论文写作的影响

纪蓉琴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探讨了中英语篇思维模式差异对英汉学术论文写作中论证方法的影响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指出,中英思维模式存在着直觉与抽象、本体与客体和螺旋与直线型差异,并因此导致英汉学术论文中论证方法在修辞手段、引经据典、引用权威等方面的使用差异.文章最后指出,只有了解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分析其文化成因,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写作的成功.

关键词:差异;思维模式;学术论文写作;论证方法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学术论文是较为专门和系统的讨论研究自然或社会问题的议论类文章,是对自然或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探讨成果的书面描述.学术论文一般包括专业部门学术论文和学校学术论文,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术论文写作,都是由具体的人来完成,其学术思维方式不可避免的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在中英写作和跨文化交际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成为极大的障碍.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历史的积淀和深层构筑,任何人都带有本国、本民族、本地域的心理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着他的思维模式,并因此构成不同的国别、民族、地域的人的思维特点和差异,在跨文化写作中反映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和方法.

2 中英思维模式差异对英汉写作修辞的影响

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方式,开始于苏格拉底、成熟于亚里士多德,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推导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古代一直到近代实验科学产生并成熟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语的传统思维模式,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大兴于明清,是传统国学研究中的

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1].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人的语言表达受思维方式的支配,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语篇组织规律,而语篇组织规律的差异,又会促使在学术论文写作中选取论证方法论证观点时产生差异.

1) 直觉型具体化思维与抽象型理性逻辑化思维

传统的中国文化思维模式具有较强的具体化倾向,而西方思维模式具有较强的理性逻辑化思维倾向.表现在语言中就是尽可能地用具体的形状、印象和声音来传递思想和信息,即所谓“观物取象”^[2].这种思维方式表现为主体凭借直观理性认识,把握外在世界.这种充满感受和体验精神的具象思维,使中国人的形象思维比较发达,注重实践经验,借助于直觉领悟来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在写作中经常使用类比、比喻、喻证和象征等思维特点.

西方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性化文化,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注重推理和逻辑.西方哲学、艺术和思维注重的是自然时空,而且尤其偏重空间的自然真实性,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英语的论证思维倾向于通过观念思维达到理论的形成,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形成抽象的概念,从而促进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因此,一般来说,西方人偏向于抽象思维,借助于逻辑在论证推理中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采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

2) 本体型思维与客体型思维

中国文化提倡以人本为主体,这种人本文化经过长期累

收稿日期:2006—09—24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校立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纪蓉琴(1962—),女,山东海阳市人,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

积,就形成了汉民族本体型的思维模式,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的思维模式。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主体,比较偏重于对自然客体的观察和研究。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人超然于自然界之外,具有绝对的支配和改造自然的力量,这种把宇宙自然看作是人类的对立面而加以研究和征服的观念,逐渐形成了客体型的思维模式,即把客观自然界作为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的中心。因此在语言表现形式上,英语基本上依据逻辑理念,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冷静的客观意识,是一种“法治语言”。汉语则基本上受形态制约,在语言单位的形式与功能的变化上往往体现一种非常灵活的主体意识,是一种“人治的语言”^[2]。

3) 螺旋型与直线型思维逻辑

西方人罗伯特·卡普兰(1966)把汉语纳入语篇模式对比研究,概括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5种类型的段落发展模式,即英语的直线式(linear)、闪语的平行并列式(parallel co-ordination)东方语的间接式(indirect)、拉丁语及俄语的枝蔓式(digressive)。汉语被纳入了东方语言的螺旋型文化思维模式,而英语被纳入了直线式^[3]。

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注意形式逻辑,形成了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概括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观点。因此,西方人在思维形式上具有一种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完备的鲜明特征。亚里士多德把演说篇章概括为引言,陈述议题,论辩、结论^[4],他的修辞学说奠定了用英语进行思维所要按照的顺序,这一顺序在发展形式中呈线形。因此,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型的。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传统不同,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与佛教都重视悟性,所以汉语重顿悟、讲含蓄,语言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直觉具体为特征,重主体意识,思维活动大多是螺旋型地绕圈向前发展(见下图)。在语言表达上,这种思维模式表现为倾向于罗列主题的背景,或客观上的条件,或说明问题的原因,或摆出事实的证据,最后再做出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是一种围绕主题绕圈子“迂回式”的思维方式^[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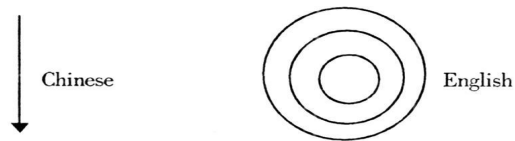


图1 中英思维模式对比

3 中英思维模式差异对英汉学术论文中论证方法的影响

中英思维模式的差异对英汉学术论文中论证方法的影响是明显的。汉语的直观、形象的思维方式,反映在文章中往往采取人证的方法,即强调说理、激扬文字,或使用类比、成语等修辞手段抒发感情,引经据典。而英语分析性和逻辑性思维决定文章倾向于法证,即强调运用事实材料,引用专家观点和数据进行客观分析推理。

1) 引用权威

英汉文章都注意引用权威的言论来证明某观点,但中国人把“权威”分为“学术”和“政治”权威,强调权威的理论高度、准确性和实效性。“学术”权威要在学术领域身居要位,且能发号施令,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政治”权威也要在政治领域颇有造诣,思想有权威性,影响很大,或者在行政领域身居高位,有真正的领导才能,独到的见地,有高尚的品格,有威望,被群众信赖,因而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5]。而英语文章则既引用权威专家的理论,也引用普通人的言论和看法。例如:

(1) 在革命者看来,大动荡是不可避免的。大动荡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没有大动荡,就不可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毛泽东曾经说过:“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6]。

(2) As learning becomes more accessible,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rewarding for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the result should be a better educated citizenry. Says Robert Glaser, co-director of the Lear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The average intelligence should be greatly moved up in the population.” (ibid.)

(3) “I don’t think Asians are any smarter,” said Don Lee, a Korean-American student at Berkeley. “There are brilliant Americans in my chemistry class. But the Asian students work harder. I see a lot of wasted potential among the Americans.” (ibid.)

在引用权威时,英汉语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做法。英语文章引用他人的话,讲究注明著作来源,即作者姓名,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等,否则,则视为犯大忌,有剽窃之嫌。而汉语文章旁征博引,从古至今,往往不指明出处,讲究裁剪融化,采取合乎自己需要的言语,融化改易,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杜甫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即语出沈全期诗:“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7]。对王继志的《新编个体作文鉴》中“学术论文”篇的统计显示,4篇中国作者的文章中无一处注明引文来源,而唯一一篇美国人的译文则既有资料来源又附有参考文献目录^[8]。

2) 运用实例、引用数据

西方文化中数理逻辑的发达以及西方人的逻辑型理性思维模式决定了英语文章在陈述论证时,倾向于较多地引用事实,尤其是调查数据和数据事实。相比之下,汉语文章则较少运用数据和实验结果来论证观点。有推测认为这和过去中国统计科学不发达、媒体报道透明度不高有关,而西方报纸几乎天天都有国家有关机构和民间“盖洛普”调查数据公布。汉语文章论证观点倾向于引古喻今,采取以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来论证观点的修辞方法^[6]。例如:

(1) The ABC-KSC Internet Poll Research Center recently surveyed 1,460 people about pornography on the Net and found 20 per cent had no problem with porn on the Net, while 80 per cent objected.^[9]

(2) Literature gives us many examples of jealousy, but a look

at daily life yields an ample supply closer at hand. Take the three-year-old child who lives upstairs. His parents have just brought home a new-born baby sister, and the three-year-old acts as if an enemy had entered the house. He is jealous of his sister. . . .^[10].

(3) “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文章要写得有说服力和隽永有味,单靠几条骨骼很难办到;还需要情绪丰满和富有联想。如果积累丰富,文思又很畅通,则笔端如流;凡义理所借以体现、文采所赖以表露的联想、比拟、辞藻,都会源源涌来,而流于笔端。于是乎“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这样,也就自然“气激于中,而横发于外”了^[11]。

例1为说明公众对网上色情画的反映,作者用ABC—KSC网络民意调查研究中心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例2作者则举三岁孩童的反映来说明妒忌心存在的广泛性;例3借古喻今,以大量的修辞手法谈练笔的作用。

3) 运用修辞手段

修辞方法在英汉议论文中都被采用,但中国人充满感受和体验精神的具象思维,较发达的形象思维,以及注重实践经验,借助于直觉领悟来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思维特点,使得中国人在选取论证方法时较英国人更多的使用类比、比喻、喻证和象征等手段。例如:

(1) 我们把疾病看作一项解剖学上或技术工艺上的事,也就更加不能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疾病。……人的疾苦,如果不能直接联系到什么解剖上的或病理心理上的技能失调,我们似乎就很难作什么认真的考虑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不得不超脱于病人的世界,以使用技术的方式把他们的疾病归纳分类。病人说话时,我们虽然在听,但却听而不闻^[9]。

(2) The music was all about experimental processes. Pleasing the ear wasn't a high priority. It also didn't exactly make you want to get up and dance. A few choreographers tried applying academic principles to dance, but the result, says choreographer Lar Lubovitch, was “wallpaper dance—all flat and decorative and cold”^[12]

例1中作者用隐喻说明了“人体就是一台机器”;例2中,作者用wallpaper比喻舞蹈的平淡,无精打采,说明这种舞蹈缺乏层次、立体感,音调无变化,因而把它称为wallpaper dance—墙纸舞蹈。据关世杰对句况的《劝学》和培根的On Studies中使用的比喻进行的调查,发现前者三个段落中用了20个比喻,寓意于喻是文章的主要特征;而后者只有四个,其作用只是补充和辅助的,主要是以冷静的逻辑来论证^[13]。

4) 引经据典

英汉文章都采用引经据典的论证方法,但与西方文论相比较,“引经据典”可说是中国文论的专利。其文化成因在于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按照宗法制“以亲统疏”的原则,“祖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产生了“尊祖敬宗”的宗法观念。这种观念自然认为祖宗生活时代的一切都是好的,于是“尊古”、“贵古”、“好古”作为古人纵向的价值取向模式便产

生了。在这种价值论中,“古”等于正价值,“今”等于“负”价值,所以“世俗之人多贵古而贱今”(《淮南子》语)。因此在思维方法上势必一切以古为据。一种言论、行为只要从古代找到了依据,其正确性就不言而喻了^[7]。而西方社会从古至今,崇尚的是圣经、希腊和罗马古典,大凡引用也大多是在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和小说中。西方民族尊重历史,但更尊重事实和现实,因此在英语议论文中,引经据典使用频率远不如汉语多。请看下例:

(1) 我们古人曾经说过:“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以正气对待不正之风,再加上改革各种不合时宜的体制,不正之风的包围可以不攻自破^[7]。

(2) Jesus warned us about the folly of putting a patch of new material upon an old garment, or of used putting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 “Positive thinking” can not be used effectively as a patch or a crutch to the same old self-image.^[6]

例1中的“古人”指古时的圣人,并未指明其出处,但其权威性昭然若揭,不仅如此,这种引用也表明了作者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而例2中的Jesus则是西方圣经中的圣人,有名有姓,体现了西方文化尊重历史,但更尊重事实的特点。同样,据关世杰对句况的《劝学》和培根的On Studies对比分析发现前者三次引用诗经,两次引用孔子的论语,还引用了《周礼》中的典故,而后者没有一处引经据典的^[12]。而蔡基刚对邓拓的《燕山夜话》五集共150篇文章进行的研究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发现几乎每篇要多次引用古人来论证,引经据典率几乎达100%^[6]。

5) 运用感召性文字和说教型语气

中国古代重“学”(学力、学问),古代的文论创作主体条件论,以“德、学、才、识”要求于作者,“学”是作家必备的重要条件之一。主体积累了学力,在创作中就是以学问为文,反映了创作主体论对创作方法的逻辑要求。因而,汉语文章中论证时的教训性语言明显多于英语文章,尤其是在结尾。典型的汉语议论文结尾都有“我们应该”、“我们必须”、“让我们”、“只有…才能”、“奉劝”等说教型语气,几乎成了现代汉语议论文的一种模式。英语的说理型论说文强调以理服人而节制个人情感,强调论理的客观性,不主张作者表露个人的感情,倡导在论证中排除感情因素,尽其“解释”而非“感召”之功能。

(1)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党和国家、人民在期望我们,历史的重任在等待着我们,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为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2) 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今天,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样才能够真正不怕天!^[6]。

(3) To ensure the best returns from the company's marketing effort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suggested:

* All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maintain good contacts with ex-

isting clients.

* A client relation's manager may be recruited and / or appointed considering the rising business through existing clients.

* The returns from national advertising should be assessed and examined before the next Annual Plan is made.

*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e email and other Internet services for direct marketing^[14].

中文表达采取直接说教型语气,英语表达则采取推荐型的方法,以显示作者客观、中立的立场,给读者一种不带偏见的感觉.

4 结论

中英思维模式差异有着各自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成因.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方向上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和具体的方向上走.语言既是思维的主要载体,也是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思维模式的差异造成语言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导致英汉学术论文写作中对论证方法选择的不同.在跨文化写作中把握住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真正实现语言的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 [1] 高小和. 学术论文写作[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 康连星. 中英思维模式的差异及对文化交流的影响[J].

天中学刊, 2000, (4), 59—60.

- [3] Kaplan, R.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J]. Language Learning, 1996, (16), 1—20.
- [4] 李松涛. 中西思维模式差异对大学生英语写作中语篇组织的影响[J]. 外语教学, 2005, (2), 52—55.
- [5] 龙小平, 等. “引证权威”与“诉诸权威”谬误辨析[J]. 黔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3, (1), 27—29.
- [6] 蔡基刚. 英汉写作修辞对比[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7] 祈志详.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用事”说[J]. 浙江社会科学, 2004, (6), 179—186.
- [8] 王继志. 新编个体写作文法[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9] 范家材. 英语修辞赏析[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2.
- [10] 冯幼民. 高级英文写作教程——论文写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曹文趣等. 现代论说文选读[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 [12] 何兆熊. 《21 世纪报》英语读物精粹[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3] 关世杰. 跨文化交流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14] 纪蓉琴. 学术英语写作技巧——英语论文与毕业论文写作[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Difference of Thought Patterns to the Influence of Reasoning Methods in English-Chinese Academic Writings

Ji Rong-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studied different thought patterns to the influence of reasoning methods in English-Chinese academic writings. By analyzing thought patterns, it pinpoints that tendencies of choosing reasoning methods differs in aspects such as rhetorical devices, citations, idioms, facts and hard data, etc. do exist in English-Chinese academic writings. It finally concludes that successful native writing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thought patterns and its cultural formation.

Key words: difference; thought pattern; academic writing; reasoning methods